

中山陵园的建设与管理

刘新天^①

孙中山先生陵墓和陵园的全部建筑工程，是由早年留学美国学土木建筑工程的刘梦锡工程师负责监理完成。刘梦锡是我的大哥，我当时也在“孙总理陵墓拱卫处”任职，直到中山陵建成和中山先生奉安。转瞬五十多年过去了，兹将当时见闻所及而能记忆的情况略作叙述。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后，根据国内南北分裂的形势，主张“和平统一救中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孙中山先生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于一九二四年带病北上，与北京各方商议国事，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积劳病发，不幸逝世。举国哀悼，暂停棺于北京西山碧云寺。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北伐战争之后，国民政府奠都南京，成立“孙总理治丧委员会”，委员有林森、蒋中正、于右任、戴季陶、居正、张继、孙科等。几经研究，按照孙中山遗愿，选定南京东郊钟山（紫金山）第二高峰小茅山（海拔一百五十八米处）为墓基。钟山海拔约四百五十九米（按：现资料为四百四十八米）。

为了选择最佳陵园图案，“孙总理治丧委员会”决定公开登报征选，第一名奖金为一万元。在众多的应征图纸中，选定了上海

^① 刘新天现为陕西省西安市政协常委。

基泰建筑事务所(彦记建筑事务所)吕彦直建筑师设计的图案。吕彦直刚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不久，是一位青年建筑师，他与负责监理孙陵的刘梦锡工程师是先后同学。刘梦锡早年由上海南洋公学(后改为交通大学)留学美国深造，与我国著名科学家竺可桢、李四光、辛树帜等俱是早期中国科学会员。吕彦直建筑师主要主持上海基泰建筑事务所工作，也常来南京与刘梦锡工程师商谈工程事宜。我曾见到吕彦直，他身体瘦弱，似有病状。果然不久，他就因病逝世，时年仅三十八岁。从此，孙中山陵墓的全部建筑任务完全落到了刘梦锡工程师身上。正如当时在“孙总理陵墓拱卫处”工作的孙中山生前副官张猛在一篇纪念文章中所说：“中山陵建筑工程的完成，全得一位六十多岁的同盟会员、工程师刘梦锡监督施工。”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在中山陵工作的老年工人，提到刘工程师也多知晓。

因当时尚无国营建筑机构，承包工程如同设计图案，同样公开登报招标，得标者有：陶馥记、新金记、姚新记、蒋复记等上海、南京大营造厂商，再由他们几家大营造厂分包给一些小的营造厂作为辅助。

刘梦锡工程师由美国回国后，就住在南京，专搞建筑和水利工程。建筑中山陵时，刘工程师被“孙总理治丧委员会”聘为监修中山陵墓的工程师，负责全部工程。因当时尚没有总工程师之设，按照国际承包工程通则，监理工程的权限是很重要的，它可以减少某部工程或改变某部工程设计，与工程设计有分工而联系紧密。

北伐战争刚结束不久，因国民政府开支浩大，经济困难，孙中山陵墓的工程费用全由海外华侨踊跃捐赠，计共得白银约四百六十万两。中山陵墓全部造价约为三百九十多万两，剩余之款在陵墓附近建造了“光华亭”、“水榭”、“音乐池”等纪念性建筑以及其

他设施等。

在孙陵开工兴建时，刘梦锡工程师亲自搬住工地监督施工，直至陵墓建成。在兴建的过程中，蒋介石、孙科、于右任、宋子文等国民党要人经常到陵墓视察工程进展情况，有时他们偕同夫人直登灵堂，有时则在陵墓牌坊前察看，还有不少外国使节也前来陵墓参观过。他们一到，往往都由刘工程师陪同参观并说明工程具体情况。

孙中山陵墓全部采用各地出产的花岗石、大理石及钢筋混凝土建成，不用木料。所有门窗及祭堂墓室保险门全用紫铜制成。台阶是用苏州金山石敲凿铺成，祭堂内黑色石柱的柱心是钢筋混凝土浇制，外皮裹以黑色花岗石，光滑坚硬，颇似铁柱。祭堂铺地系用云南大理石。墓室内壁采用夹墙，墓穴宽广，可容纳一、二百人。铜棺安放在墓穴中央。原计划每逢中山纪念日，将铜棺由墓穴吊上来以供瞻仰，后经研究认为，中国古习，人死以入土为安，将铜棺吊上吊下似有不妥，遂决定将铜棺安放于墓穴之中。在墓穴之上，安放孙中山先生石雕睡像供人们瞻仰。祭堂内四角小房为备作接待休息室之用。陵墓台阶上摆的石雕香炉、花盆，大都为各省赠献。中山陵墓所用全部石料，大的重达几十吨，在当时无机械设备的情况下，都是用滚木人工推到陵墓，任务相当艰巨。

为了迎奉孙中山灵柩，由南京挹江门外中山码头起，修建了一条迎柩大道（即今中山路）直通中山陵墓。这条大道在陵园的一段（即朝阳门到陵墓一段），仍由刘梦锡工程师监修。这条路先用大石铺底，再加上小石，灌泥浆后浇沥青，非常坚固，为此曾受到南京市政府的称赞。在修铺灵谷寺的石子路面时，刘工程师考虑到老年人和穿皮鞋的妇女行走方便，就在石子路面的两边加铺了长条青石板。事情虽小，但可以看到一个工程在施工时设想得周详细致。

中山陵园范围内有不少名胜也是刘工程师监修，灵谷寺附近的九层钢筋混凝土纪念塔就是其中之一。此塔是初次建造，尚无经验可以借鉴，因此在塔建成后不久，刘工程师一直惦念着塔的情况。南京沦陷后，刘工程师在外地八年，仍然常想起南京的一些亲自监修的建筑。抗战胜利后，刘工程师回到了南京，看到自己亲手建造的建筑物非常稳固，心里十分喜悦。

中山陵落成之后，就举行了奉安大典，我们都有幸参加。奉安典礼和中山灵堂的布置，也是经过了周详妥善的安排。抬灵柩的人经过了挑选训练，一路步伐整齐，平稳地抬上了三百九十二级台阶。祭堂内放置的花圈，反映了国际友好人士对中山先生的深厚情谊。除各国元首和使节及国内各界人士送的挽对、花圈外，在陵墓祭堂的中山坐像左右置放的日本友人送的花圈，存放时间很久，给人印象最深。我在中山陵墓拱卫处工作，对此了解比较清楚。记得有中山先生的好友犬养毅、头山满、宫崎滔天、萱野长知、宫崎寅藏、内田良平、坂本寿一、寺尾享、梅屋庄吉及吴锦堂（日本华侨）等送了花圈，其中以犬养毅、头山满的花圈存放时间最长。犬养毅是日本著名政治家，宫崎寅藏在日本福冈寺的“玄洋社”曾支持过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他们的花圈是用金银叶制成，装在一米多高的一座玻璃盒内，十分醒目。特别是梅屋庄吉先生，他与中山先生感情很深，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婚礼就是在他家举行的。在孙中山逝世后，梅屋庄吉先生克服了经济困难，耗费了巨额资金，用了四年多时间铸造了五尊孙中山铜像（按：有资料记载为四尊），以后分别竖立在南京中山陵、广州中山纪念堂、黄埔军校旧址、中山大学及武昌起义纪念地。中山先生安葬时，各方面送的纪念礼品很多，有的就陈列在小茅山上的万福寺内，我父亲刘文卿曾一度担任过保管员。此处后改为“奉安纪念馆”。不幸的是，陈列的礼品

在抗战中被毁。

中山先生安葬后，各省市参加奉安的代表及工作人员都得到“哀思录”一套，孙中山铜像一枚，装于锦盒内，铜像在美国纽约定制，各方面人士送的挽词均刊登在“哀思录”内。“哀思录”已经散失，铜像今天仍由我珍藏着。

中山陵墓和陵园是一个整体，起初都归“总理陵墓拱卫处”管辖。拱卫处是一个军事编制的行政组织，直属国民政府。主要任务是保卫陵墓，接待参观者。所有在陵园内的户口、商店都归拱卫处调查登记，任何人要参观祭堂，须经拱卫处允许。拱卫处的职员、卫士均着军服，大都是跟随过孙中山的副官和卫士，多为广东人或从广东来的。我也被选入拱卫处工作。拱卫处处长黄惠龙、副处长马湘都是孙中山的亲随副官，在陈炯明叛乱时，黄惠龙曾背负孙中山至海珠登上“永丰”舰脱离险境。我在拱卫处期间，每周都要参加陵园的植树修路劳动，明孝陵附近的一条石子路就是我们铺的。不久，拱卫处改组，由马湘任处长，拱卫处归陵园管理委员会编制。陵园管理委员会由林焕廷、傅焕光负责，统管陵园一切事宜。我离开拱卫处后被咨送监察院当书记官，刘梦锡工程师在中山陵墓等工程完成后转到导淮水利委员会任主任工程师。解放后，刘梦锡工程师应邀由上海到西安担任西北财经委员会工程师及总工程师。

一九七八年，我又重游江南各地，在南京首先驱车中山陵园，瞻仰孙中山祭堂。只见中山陵前广场到祭堂，整洁干净，无片纸杂物，花树茂盛，台阶白净；进入祭堂，秩序井然，清香扑鼻，精神为之一振。我在陵墓工作过三年，看到如今这样好的管理，确胜往昔，感触殊多。只愿海峡两岸炎黄子孙早日携手，共展宏图。

一九八六年五月